

快言快语

让孤儿生活有尊严
是全社会的责任

□ 孙瑞灼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下发了《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维护孤儿基本权益，使其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11月18日中国新闻网)

《意见》从孤儿的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做出了系统的安排，对于确保孤儿的健康成长将起到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意见》的出台可谓全国孤儿的福音，标志着我国的孤儿保障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我认为，让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2005年全国孤儿排查数据显示，我国孤儿总数为57.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4.43，其中生活在农村的孤儿有49.5万人，占孤儿总数的86.3%。这些孤儿失去父母，无人抚养，处于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是社会上最弱小、最困难的群体。饥饿、疾病、生命安全等阴影每天都笼罩在他们头上，不少孤儿甚至被迫走上了卖淫、吸毒、抢劫等犯罪的道路。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孤儿救助力度，但调查显示仍有超过三成孤儿没有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救助。面对庞大的孤儿群体，显然仅靠政府的力量救助还不够。一方面政府的资金毕竟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服务在很多方面无法覆盖和满足孤儿成长的全部需求。政府可以给这些孤儿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不至于挨饿受冻，但政府无法给他们父母般的温情和爱；政府可以提供一个成长的基本环境，但一个人的成长更需要良师益友和心灵的沟通。孤儿的精神、心理问题以及成长中的困惑等问题，都不是靠钱能解决的，所有这些都需要社会和我们每个人来承担。

保障孤儿健康成长，让孤儿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整个社会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它需要我们每个人奉献爱心。失去父母的孤儿无依无靠，政府和社会会理当成为他们的依靠。每个人都应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伸出援助之手，让这些孤儿也能感受到幸福和尊严，让他们幼小的心灵沐浴在爱的阳光下健康成长。只有政府和社会相互配合、良性互动，建立起一个“政府出资、社会支持、人人参与、家族抚养”的孤儿保障模式，才能给孤儿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关怀和保障。

头条评论

□ 杨涛

国务院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于11月17日召开全体会议，进一步分析事故原因和问题。会议指出，这次火灾事故暴露出5个方面的问题，其中装修工程违法违规，层层多次分包，导致安全责任不落实；有关部门安全监管不力，致使多次分包、多家作业和无证电焊工上岗，对停产后复工的项目安全管理不到位，是产生火灾的

重要原因。(11月18日《人民日报》)

违法分包其实早就是建设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只不过，这次上海的大火再次烧出其原形。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07年第2号审计公告指出，全国34个高等级公路建设项目，其中有的项目被建设单位违规直接发包和指定分包工程17.96亿元，施工单位违规转分包工程达72.39亿元。而据商务部消息显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已向境外承接的工程蔓延，在国际上造成不良的影响。在今年浙江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浙江省政协委员陈焕昌提出，目前建筑工程普遍存在的违法转分包行为，在行业内，甚至包括有关行业管理部门都对转

分包问题视为行业“潜规则”。

建设工程的分包是允许的，但是，合法的分包是指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中的专业工程或者劳务作业交由具备相关资质的建筑企业完成的行为。但要符合如下条件：一是总承包合同必须是有效合同；二是承包人分包时必须分包给具备相应资质的分包单位；三是分包必须基于合同的约定或取得发包人的许可；四是施工总承包的建筑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总承包单位自行完成；五是分包只能进行一次，不得层层分包。与此相应，违法分包是不被允许的。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施工企业，未经建设单位认可，总承包人将

其专业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总承包人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分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等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像上海这一事件违法分包主要体现就是分承包人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再分包，也就是多次分包。

很显然，违法分包将留下诸多隐患和导致严重的后果。其一就是让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人能够承揽工程(劳务)，产生安全隐患和事故。上海这一事故就是违法分包、多次分包，导致无证电焊工上岗，导致发生特大火灾；其二，同样由于违法分包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人承揽工程(劳务)，极易留下质量隐患，甚至是豆腐渣工

程；其三，违法分包也容易造成工程款层层拖欠，最终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违法分包现象的泛滥，当然有法律规定上的不完善的问题，比如必须更加明确违法转包行为的认定标准，规范招投标管理，建立“工程建设不良行为和黑名单”制度，建立企业诚信体系，等等。但更重要的是必须落实监管责任，加大对监管部门的监督与问责。在上海这次事件中，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作为一个分包商，在安全生产方面明显资质不佳，但就是这样一家企业，还将工程进一步作了层层分包，有关部门仍然坐视不管，最终酿成大祸。这样的惨痛教训，无疑值得深刻反思。

廉租房闲置源于不“廉住”

□ 吴睿鸫

11月17日，审计署发布了19个省市2007年至2009年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审计调查结果。由于廉租房配套设施不完备、地址偏远、交通不便等，南京等13个城市的一些地方存在廉租房房源配租困难、房屋闲置的问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已入住家庭退房的情况。(11月18日《人民日报》)

当当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第二财政的现实语境下，政府如果把廉租房建在城市中心，那么必然要损失很大一笔土地收益，而建在城郊外，政府不仅在表面上承担了应尽的义务，又能让巨额土地出让金装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选择位置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地方建设廉租房的根本原因。

反观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廉租房建设选址上，都考虑到穷人的生活成本和就业机会，以及贫富对立等诸多因素，也正因如此，在美国，建造了大约130万套公共住房(廉租房)，根据1991年的数据，74%的公共住房建在市中心。而日本，也是把廉租房建在东京等大城市的中心地带或热闹区域。

到目前为止，廉租房注重“廉租”轻视“廉住”的怪癖，并未引起一些地方政府的关注和重视。事实证明，廉租房建在哪，看似是简单的区位选择，其实，它则考验着政府关怀贫困群体的诚意，关乎着社会的稳定，影响着社会的和谐，各级地方政府绝不能视而不见。

“我不讹人”呼唤信任而不是道德

□ 陈一舟

11月15日下午，河北邯郸市一位七旬老人摔倒在联纺路上，在长达半个小时里行人们视而不见。途经此处的出租车司机王铁军将老人救起后，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谢谢你，放心吧，我不会讹人！”(11月18日新华社网)

河北邯郸的这位老人一句“我不会讹人”的感谢语，让我立即想起了南京市另外一位老汉的悲怆呼喊：“我自己跌倒的。”一名75岁的老汉在南京市下关区三汊河公交车站下车时，一头从公交车后门跌倒在

地，当场爬不起来，跟在身后的乘客都不敢上前救他，老汉大喊：“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听了这话，众乘客才上前救他。

不同的地点，雷同的一幕。他人有难，不敢伸手。无论我们承认或者不承认，这样的事情都已不鲜见。每逢读到这种新闻或者亲身经历这种事情，我们的耳边似乎都会回想起南京“彭宇案”的被告彭宇走出法院大门所说的一句话“再不会这么冲动了”。不能怪我们太敏感，而是此类发生在身边的道德遭遇讹诈事件太多太频繁，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不堪而难安的道德阵痛中：伸手还是不伸手？万……

社会需要美德，社会公平正义永远离

不了道德的力量。而时下，道德的义举屡屡遭遇不道德的“诬陷”，无数的现实案例诱导着足以影响一个社会的负面情绪。而由此引发的是社会道德的集体退化。极端的个例，具有相当强烈的辐射性，从个体的迷惘到群体的担忧，最终影响着大众的社会行为。

我们正在从“熟人社会”大步走向“陌生人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曾经这样分析“陌生人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可如果连伸手扶人都不敢，漠视他人危难于眼

前，我们如何能成功实现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

在陌生人社会中，失去了“人情与血脉”的联系，面对城市中来来往往的陌生人，除了法律的监控之外，我们需要以涵盖公民素质、公民精神等在内的契约理性来维持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履行社会责任。“济危扶困”和见义勇为成为稀缺品质，相对应的表象是道德的沦落，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公民契约理性力量薄弱导致的社会信任纽带断裂。信任的断裂，加剧了道德的沦落——“我不讹人”呼唤的是信任而不是道德，不敢伸手的道德恐惧正是一种社会信任危机的阵痛，对此进行广泛地道德倡导于事无补，当务之急的是如何让公民精神尽快成长起来，修补起那一条社会信任的纽带，才能实现根本上的道德救赎。

还不能依法行政。让贫困人口有话语权，就是要让他们能在这个社会中自由地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争取，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关部门还对它们进行打击。如有的农民就是因为土地被不合理的征用后上访，被有关部门进行打击，从而使他们不敢发声。

当贫困人口的话语权弱小时，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决策时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必然会在政策制定上不能很好的向他们倾斜。因此，给贫困群体更多的机会，给贫困群体更多的话语权，就是最好的帮助弱势群体脱贫脱困的办法。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制定上，要多照顾贫困人口，要创造机会让贫困人口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没有机会的贫困才是真贫困。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贫困，如此我们的社会才会有更大的希望，更多的和谐。

没机会的贫困才是真贫困

□ 肖华

人民日报记者近日调查了弱势群体生存状态。张中周是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杉树乡大寨村贫困农民，他说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有专家称，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11月18日《人民日报》)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说的那样，“贫困必须被视为是一种对基本能力的剥削，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是这么多年，我们不少地方都把贫困看成是收入低下，在减少贫困的人口上，总是想出办法提高他们的收入，如帮助他们找致富项目、帮助他们找工作，给他们资金等，但是很多地方还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贫穷并不可怕，只要还有机会能改变贫困，很多人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有信心的。可是最怕没机会，看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勤奋都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才是最可怕的。人一旦失去了信心，也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人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又怎么会去奋斗、努力？

一个贫困农民说出了“苦累都不怕，最

怕的是没机会”，也许道出了很多贫困群体的心声，这样的话不能不对我们有所启示。在扶贫进入新阶段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给贫困人口更多的机会上，放在给贫困人口更多的话语权上。只有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的话语权，他们就会更快的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

令人警惕的是，很多地方都没有重视这一点，导致贫困人口的话语权越来越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低收入人群的代表太少，在话语权上没有优势，在政府决策上影响力不大。话语权的过弱，使他们的利益没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有的地方

新华社记者 周宁

的京剧就更没救了。我一听京剧交响乐，浑身起鸡皮疙瘩，让我多活两天行不？”

也有不少观众对这种新形式挺宽容。观众张耀蕊点评道：“京剧的文场有点儿单调，在喧嚷、快炒气氛下来说交响乐，在我看来，细腻感情之间穿插弦乐甚至有些和声，效果还不错。”

面对观众的品评，梅葆玖坦言，交响乐和京剧表面上水火不容，实则并不矛盾。

“我从小就很喜欢交响乐。那时父亲从国外经常带给我不少古典音乐唱片，我特意学习国外歌唱家的发音、气息等练声方法，对京剧表演大有裨益。”

EOS乐团首席指挥胡咏言教授从发展史的角度把交响乐和京剧比作“亲哥俩”：“京剧的全盛时期是乾隆时期（18世纪晚期），而这恰恰是莫扎特和古典音乐的鼎盛时期；京剧当时在皇宫或大户人家演出，而古典音乐也叫‘宫廷音乐’；现如今，它们都遭遇着受众群减少、普及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问题的关键不在二者该不该混搭，而是没有很好地融合。作曲结构松散，配器不着边际，结果成了‘魔鬼与嫦娥共舞、领带和礼帽齐飞’。”著名作曲家叶小钢认为，西乐与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结合未尝不可，但要在调式衔接、乐器搭配、节奏掌控等方面下大工夫才行。

“现在不管啥新编戏都得跟交响乐合作，还美其名曰‘洋为中用’，我看是哗众取宠。”交响乐迷陆嘉文对记者说，“本来交响乐在中国普及就困难，再加上‘同病相怜’，

综合

文化新闻

“不伦不类”还是“相得益彰”？
——交响乐混搭京剧、摇滚、曲艺引发热议

新华社记者 周宁

“用‘垃圾’糟蹋‘高雅’？”

中国“摇滚教父”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跨界合作的“摇滚交响诗”即将在北京亮相。报道称这场音乐会票价比王菲演唱会还高。

北京交响乐团首席指挥谭利华表示，他与崔健等人仔细研究了先前摇滚与交响乐调配摇滚“垃圾”，简直在糟蹋艺术。

对此，崔健说，商业合作不是他所考虑的。“摇滚与古典之所以有些排斥，是因为有些人总以为古典音乐是宫廷式的、贵族气的，而摇滚乐是旁门左道、不入流的，所以不屑染指。这是一种误解。”

崔健认为，摇滚有一种“在苦难中破而后立”的感受，需要古典音乐营造苦难的氛围，形成互补。“我想象中的摇滚乐章会更加强化。”

有古典音乐背景的崔健曾是一名小号手。他所演唱的摇滚歌曲《一无所有》，无论是悲凉的音乐还是深厚的低音，都来自古典交响乐对他的熏陶。

一位乐评人认为，交响乐和摇滚是相

通的。著名音乐人三宝和崔健一样，也曾经过严格的古典音乐训练。他置“古典逃兵”的帽子于不顾，先后创作《不见不散》等上百首脍炙人口的作品。

“把交响乐拉下神坛？”

这两年，交响乐混搭“西河大鼓”“天津时调”甚至“海派清口”的演出层出不穷，上座率高得惊人。

最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周立波、余隆合说“海派清口交响乐”。在这场音乐会上，从小提琴到大提琴，从小号到大号，周立波用海派清口方式向观众介绍了交响乐数十个声部和几十种乐器，令观众捧腹大笑，印象深刻。

余隆解释道，这种演出形式在国际上空见惯。“如果用周立波的明星效应，把观众引入音乐厅，通过他的幽默讲解提高百姓对高雅音乐的理解，那绝对是好事。”

两获奥斯卡奖的中国喜剧院演员彼得·乌斯蒂诺夫，曾作为古典音乐的推广者，用诙谐的语言录制交响童话《彼得与狼》，广为流传，一下子令古典乐亲切了起来。

“交响乐‘跨界’，不是要把它一脚跨到音乐圈外，而是要让圈外人跨到内来，用幽默的方式把交响乐拉下‘神坛’，让观众知道古典音乐并非高不可攀我就满意了。”周立波最后说。(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清华纪念钱钟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李江涛)今年是我国已故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百年华诞，清华大学师生连日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深情缅怀这位清华优秀毕业生。

在18日的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学生话剧队和化工系同学共同奉献了一场声情并茂的朗诵，以钱钟书先生经历为时间脉络，分学生时光、游历英法、执教清华、学术人生、家庭生活五个阶段回忆钱钟书先生。

2001年与钱钟书夫人杨绛签订《清华文学好读书奖学金金基信托协议书》的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贺美英回忆说，早在1993年初，钱钟书、杨绛先生就打算捐设奖学金。1996年，钱先生病重而其爱女钱瑗已病危时，三人在病榻前商定，这个奖学金不用他们个人的名字，就叫“好读书奖学金”，用帮助那些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好读书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共同爱好，他们都把读书治学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奖学金决定设在全家最爱的清华大学，钱先生和杨先生都曾在清华做学生、当教授；而对于钱瑗，清华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

据悉，为纪念钱钟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除师生座谈会外，还有专题演讲、大型图片展览等。

康熙战袍将现拍场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岳瑞芳)记者从北京北纬四十度大成国际拍卖公司获悉，在即将举行的北纬秋拍上，海外回流的清康熙御用战袍将现身拍场，这也是在国内拍场出现的第一件康熙御用战袍。

黄色云龙纹暗花缎面绵盔甲为康熙在位时的实战御袍，盔高29厘米、直径27厘米。甲衣身长68厘米、肩宽42厘米、下摆宽84厘米。围裳腰围100厘米、高92厘米。

盔为钢质，盔梁上刻梵文，盔沿饰鎏金龙纹。盔顶立缨管，盔缨缺失。护耳、护耳和护颈均为黄色云龙纹暗花缎面，内絮丝绵，上编缀鎏金铜钉。甲为上衣下裳式，由甲衣、左右护肩、左右护腋、左右袖、前挡、左挡和围裳(分左、右两块)11部分组成，穿着时由纽扣、皮条和丝线连成一整体。其中护肩缀有鎏金铜钉，护腋为云头状，前挡为腹部前方的一片梯形护腹装置，左挡设于腰间左侧，腰右侧因需佩箭囊，则不设这种装置。围裳分为左右两幅，穿时用带子联结系于腰间，两幅围裳的内侧膝盖处各系一块月白色绸缎内嵌钢片的护板。此外，前胸、后背各悬圆形钢质护心镜一个。

这套盔甲用黄色云龙纹暗花缎作面料(其外表曾敷青蓝色颜料，现脱落殆尽)，内絮丝绵，通身钉缀鎏金铜钉，以增强绵甲的耐磨性和防护性能。整套盔甲的边缘从外向内为镀青色章纹边、编结丝线边和菱形鎏金铜钉边各一道，颇具特色。

饶宗颐作品拍出1065万港元
全部捐助敦煌研究院

新华社香港11月18日电 (记者陈静)

第六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揭晓
《巴基斯坦难民儿童》
获新闻照片大奖

新华社上海11月18日电 (记者李荣)

第六届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18日在海上松江举行了颁奖典礼。澳大利亚摄影师丹尼尔·贝雷胡拉克拍摄的《巴基斯坦难民儿童》获得本届华赛新闻照片的大奖。

据了解，在本届“华赛”中，经过13位中外资深摄影家和图片编辑的精心遴选，从来自世界五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0多幅摄影记者和摄影师的3万多幅(组)参赛作品中，共评选出8大类16项新闻摄影作品的金、银、铜奖和优秀奖68个，其中，国外获奖作品的数量达到55件，进一步体现了“华赛”的辐射力、影响力、国际性和权威性。